

中日战争初期侵沪日军对公共租界的政策及其演变^{*1}

刘峰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在中日战争初期,侵沪日军对于上海公共租界是心怀不满、抱有野心的。因此在战争推进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向租界施压,妄图渗透己方势力,打压中方在此地的抗战活动。由于租界当局与驻沪英军采取了妥协、绥靖的态度,日军的要求不断升级,日趋强硬。最终在1937年12月初,以过境租界、示威行军的形式走向了高潮。这种野蛮侵略与嚣张跋扈的做法,刺激了中方的抗战斗志,招致了列强的反感,从而为其失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中日战争;日军;上海;公共租界

DOI:10.13806/j.cnki.issn 1008 7095.2017.05.011

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而战争初期所爆发的上海抗战,又是中日战争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课题。上海,作为当时东亚屈指可数的国际性大都市,不仅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存在着公共租界这一特殊地区。日军向上海发起侵略,不仅意味着战争向华中地区的全面扩大,而且也意味着中日战争绝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事实上也将国际社会的各方势力牵扯在内,情况复杂。可以说,日军在侵沪期间与公共租界所发生的摩擦交涉,既是上海抗战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日本与西方列强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从日军的侵沪策略,尤其是与公共租界摩擦交涉的角度切入课题、展开考察,既具备了学术价值也存在着研究意义。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分析^[1],但一些问题仍未能完全解决。比如在战争初期,侵沪日军对于公共租界的实际态度究竟如何^[2],其根本目的是什么?他们从何时开始与公共租界展开交涉,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交涉的,其间,是否发生过策略上的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租界方面的态度如何?保持“中立”的公共租界为何曾出现过日军的过境行动?等等。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些问题,拙文拟基于既往研究的宝贵成果,发掘考证中日双方的原始文献展开探索分析,以期学界的相关研究做些补充。

一、战争的爆发与日军的战略试探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正式开启。而仅仅一个月之后,日军便以“大山勇夫事件”为口实,将战火引向了上海为首的华中地区。8月15日,日本军部正式组建了“上海派遣军”,并向其下达了侵占上海,“保护帝国臣民”的指令。由此,日本帝国主义针对上海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动便正式开始。

在侵略之初,考虑到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复杂环境,日军中央的参谋本部曾专门针对公共租界与列强的问题向前线日军叮

¹ 收稿日期:2017 01 12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政军档案整理与研究”(16JZD036)

作者简介:刘峰,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嘱：“一、需要让国际社会理解我方的正当行动；二、努力保持与列国军队之协调；三、努力避免使战祸波及上海租界。”^[3]进而在一周后，由陆、海、外三省大臣正式确定，由陆军次官向前线日军参谋长发去的《帝国关于日中事变的对欧美外交方针》中又明确规定：“应谨慎避免刺激他国之类的言行与极端事态的发生，若万一发生事态，亦应尽力迅速稳妥地加以解决。”^[4]由于这些文件都由日军中央制定，抑或是由其参与制定，故可认为事实上表明了日军中央将要尽量回避与列强发生矛盾的态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上海的公共租界没有不满。比如，在上述文件《帝国关于日中事变的对欧美外交方针》的后半部分，还有如下说明：“英国基于英中两国的密切关系，在此时展开了积极的支援，对事变实施了干涉。……这导致中方在英国的援助之下越发表现出了抗日的态度。……这将会给日英两国的国交带来根本性的恶果。”^[5]而作为前线日军的最高指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也在与“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长松本重治的私下谈话中表达了与日军中央大致相同的态度。即，一方面对于“无论如何不能损害第三国利益，而且应当绝对避免同第三国的武力摩擦”的意见表示赞同^[6]；另一方面却又抱怨称：“（对于中国，）外国已经超出了道义支持的程度。”^[7]可以说，正是这些内心的不满，为此后日军与公共租界的摩擦埋下了伏笔。

9月10日，日军又派遣了三个师团增援上海。在得到增援之后，为了尽快占领上海并切断中国的财源，松井确认了自北向南阻断沪杭铁路（海杭线）的方针。这一侵略方针，显然意味着日军部队将会迅速逼近公共租界，从而与其在政治、外交与军事层面发生更为直接的关系。而此后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与北面日军相互呼应夹击中方战线的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10月23日，驻守大场镇、江湾镇防线的中国军队开始后撤^[8]，并按预定计划退防至苏州河南岸，打算凭借有利地形构筑起阵地继续抗战。而通过飞机侦察到这一情况的日军随即实施了追击，在攻陷大场、江湾之后开始大举进逼苏州河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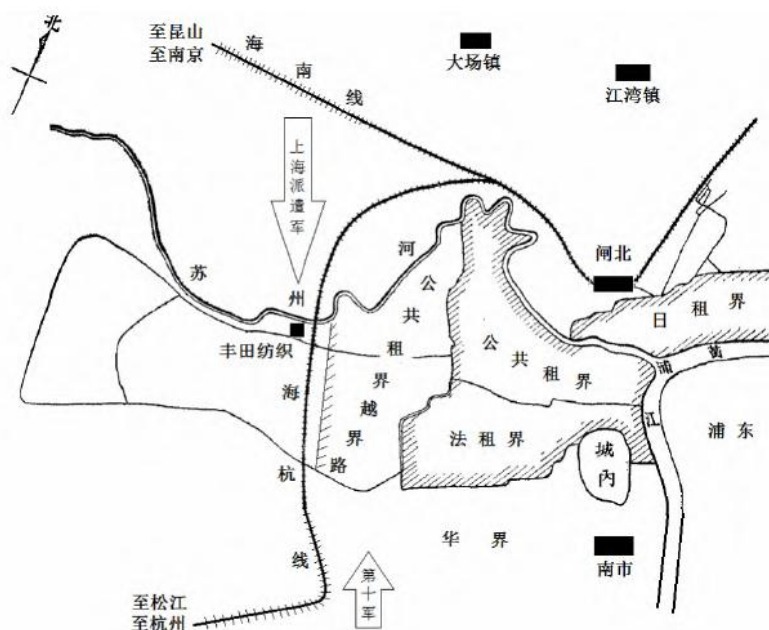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的公共租界与日军主攻方向

资料来源：对下述资料中的地图进行充实整理后制成：上原蕃：《上海公共租界志》，东京：丸善株式会社，1942年，第258页。

可以说对于这条防线的争夺，日军是颇为重视的。一方面，这是中国“在上海战斗的最后一道屏障，防守上海的最后一生命线，为了守住上海，确保中国东南地区的门户，这条战线已是非守不可的了”^[9]；另一方面，中国军队为了实现防守的目的，

刻意将核心阵地构筑在苏州河南岸毗邻公共租界西部的越界路地区。这势必将导致日军为避免误炸公共租界而在进攻上有所顾虑。故为了攻陷这条防线，日军开始在租界的问题上动起了脑筋。同时，随着中国军队的撤退，公共租界开始日渐成为“孤岛”，但它绝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尤其是，中国方面严重缺乏重工业和军工设施，在军事上必须仰仗于外国进口，这也使得租界成为国民政府主要获取战略物资的要地之一。^[10]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侵沪日军从此时起在军事作战的同时，亦开始尝试与主导公共租界军事事务的驻沪英军进行具体、直接的接触。^[11]而他们首先采取的，便是一系列试探性的手段。

首先，是对丰田纺织工厂的接管问题。在苏州河南岸的中国阵地附近，有一处名为丰田纺织的日本工厂，该工厂因为远离日本租界、毗邻公共租界之故，在战争开始之后一直由英军代为警备。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军队的阵地附近飘扬着英国国旗，令日军的侵略行动颇受掣肘，渡河进攻面临着复杂的困境。^[12]对此，蒋介石亦曾在其日记中有过专门的记载：“上海右翼各部皆照预定计划安全撤退，移转于苏州河南岸。英军……为敌代管之丰田纱厂，实于我以后阵地有益。”^[13]

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日军开始谋划通过驻沪外务机关的渠道与英军方面进行交涉。早在10月25日，“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便已向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提出了要求：“大场镇、江湾镇的敌军已向西南方向退却，今后的战斗将会在苏州河一带展开。此处有我方的丰田纺织工厂，且英国兵驻扎于此。我军无论如何加以注意都容易发生误会，故请迫其撤退至铁路（即当时的海杭线铁路）以东地区。”带着这一要求，冈本在次日亲自拜访了驻沪英军司令官史摩莱（Alexander T. Smollett）。在会谈中，冈本首先对英军长期以来的警备工作表示了谢意，随后提出了要求。对此史摩莱表示：“在原则上，（我军）对于撤退并无任何异议”，然而“为了日中双方作战的公平起见，撤退的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从丰田纺织工厂撤走英军，对于中方来说是不公平的，故难以答应这一要求。”不过，鉴于当时偶有日军飞机炸弹落入英军阵地的危险事态发生^[14]，他在此后又话锋一转，表示：“若英军部队确实面临危险，英方愿自主地令其撤退并向日方通报”。^[15]

结果在次日下午两点左右，史摩莱便下达命令，主动撤走了此处的英军并向日方进行了传达。这间接导致中方的苏州河防线于11月初宣告瓦解。可以看到，虽然租界方面在战争期间对于中国的抗战表示出了同情乃至支持的态度，但战争局势一旦危及其自身的安全，他们仍会在绥靖政策的指引之下表现出妥协、退让的态度。而正是这种在压力之下主动松口、让步的做法，让日军看到了公共租界的软弱，也看到了进一步提出要求的可行性。故可以说其初步的试探取得了成功。

在尝到甜头之后，日军随即开始着手新一轮的试探工作。就在英军表示妥协的两天之后，29日，日军水雷艇“出云号”便借口接到美军舰队长官“协助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队”的邀请，从黄浦江擅自驶入当时属于“中立地带”的苏州河水域。在航行至福建路与苏州河交叉的老闸桥^[16]附近时，负责把守此桥的英军士兵将“出云号”拦截下来并登上甲板进行交涉。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名英军士兵忽然走近甲板上的速射炮，试图掀开上面的帆布进行检查，却被身边的日军指挥官当即阻止并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日军陆战队的参谋长藤田利三郎与英军司令官史摩莱闻讯赶抵现场处理，才终于勉强平息了事态。^[17]

然而到了当天晚上七点，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日军炮兵突然将一枚炮弹射向了距离丰田纺织工厂足有一公里距离的公共租界越界路地段，导致警备此处的三名英军士兵当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八名无辜居民殒命。^[18]对此，租界方面立即提出了严重抗议。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不得不带领部下赶去慰问并表达歉意。然而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却以“军务繁忙，日后再议”^[19]为由推脱了过去，仅派遣了一名叫宇都宫的少佐军官出面敷衍。^[20]最终，此次事件不了了之。外务官员再次扮演了为军队收拾残局的角色。

可以推测，这或许正是日军对于白天在苏州河上发生冲突所实施的报复性行动与武力威胁。这一举动显然将给一直挂念自身安全的英军士兵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而侵沪日军高层亦在此后发给英军长官史摩莱的文件中表示出了强硬的态度，宣称：“苏州河原本并不属于公共租界一部分，故对于出云水雷艇之行动破坏租界中立性的说法表示反对。帝国海军舰艇在必要之际，无论何时，都理应拥有自由使用该水域的权利。”^[21]这一表态无疑说明，在此前的试探中获得成功之后，日军已经洞悉了租界方面的弱点。他们此时的态度，开始变得日趋强硬起来，乃至最终发展成了赤裸裸的武力恫吓。在这样的压力与威胁面前，英军不得不再次表示了屈服。11月12日，在美国与意大利驻沪总领事的斡旋劝说之下，英军主动向日军发去通告，表示将从即日起

完全开放苏州河的水路，并同意日军自次日起通过该河将军需物资运送至前线。^[2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战争爆发以后，无论是日军中央还是前线日军都曾表示将尽力避免与公共租界发生矛盾冲突，但实际上却对其同情、支援中方的立场心存不满。在战火逐渐逼近租界之后，日军开始尝试与租界，尤其是英军高层发生直接的接触。在这一过程中，日军首先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的做法以期探明对方真意。结果英军的回应是极为软弱、退让的。这势必刺激了日军此后进一步展开交涉、施加压力的欲望。

二、日军策略的变革:战略与政略相结合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上海西南方紧靠杭州湾的金山卫地区成功登陆之后，随即与“上海派遣军”合编成立了“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方面军司令官。鉴于作战任务已从“保护臣民”更改为“挫敌战斗意志，扫荡上海附近之敌”^[23]，松井开始向“第十军”下达南北夹击苏州河防线的指令。结果在腹背受敌的被动形势之下，中国军队不得不于11日深夜全面撤退，仅留下部分人员在租界有组织地开展抗日宣传，推进抗战活动。

伴随着这一战略形势的变化，日军的侵沪策略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这一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 对于前线，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打击中方的抗日信心，立即从阵地进攻转入追击状态^[24]；2. 对于后方，为了巩固进一步作战的基础，更为重视占领区的扫荡工作，并加强了对租界内抗日活动的关注。这显然意味着，无论是为了前方的侵略，还是为了后方的扫荡，日军都将对公共租界施加更大的压力，提出更多的要求。

同时，在日军突破苏州河阵地之后，由于“对任何方面的交通，‘中国人’的交通工具，全部不能使用。……无论走南通、宁波、青岛或者香港，都成了外商轮船独占的航线”^[25]，逃往租界的难民呈现出了直线上升的趋势。这股汹涌的难民潮，与7月24日“宫崎事件”^[26]以来就已陆续进入租界的难民一道受到了租界当局的保护。对此，日军极为不满，大肆指责称有不少中国军人夹杂在难民之中，在租界内继续开展抗日活动。比如当时日本的驻沪外务机关就曾援引军方的观点公开宣称：“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文武各机关，依然残存于租界之内……企图利用租界对我方的军事行动实施直接和间接的阻碍……并且还向那些试图返回以前（在租界以外）居住地区的难民施加影响，宣传抗日思想。”^[27]对其而言，上海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不仅仅是“中国的上海”，亦是“世界的上海”。在租界范围内所开展的这些反日宣传，本身就兼具向西方各国宣传的性质，极易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和外交中将日本推向“孤立”的境地。故考虑到以上各种原因，侵沪日军针对公共租界的活动开始变得愈发积极起来。这无疑说明：此时日军在上海的活动已经从“军事战略为主的阶段”开始走向了“战略与政略相互结合的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为首的前线日军高官开始公开、直接地与租界方面展开交涉。比如在11月11日中国军队全面撤退的当天，松井便召集西方记者举办了媒体见面会，在接受采访时他首先表达了对租界内抗日活动的担忧，进而公然宣布了如下三点态度：1. 日军虽然曾尽全力谋求与列强的协调关系，但在过去的两个半月时间里，“英、美、法、比等国的态度却发生了显著变化，且各国在上海的官员，态度亦有所变化，故可认为目前的协调工作是极为困难的”；2. 鉴于目前租界内仍充斥着大量反日分子与抗日活动，“无论列国的态度如何，日方都有权进行自由的活动”；3. 从军事上来说，“苏州河以南地区（包括公共租界一引者注）和以北地区并无任何区别，且作为个人的考虑，对于法租界也将采取相同的态度”。^[28]这种无视列国权益的蛮横态度，立即引发了列国的不满。同日，英国驻日大使便向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提出了警告：“此等言论让人深感遗憾，期望松井大将的言论不过只是谣传，不要违背了日本政府此前所做出的尊重英国权益的承诺。”^[29]而法国总领事，以及负责公共租界行政事务的工部局参事会董事，亦在13日的信函中对松井无理的发言提出了抗议：“（对租界内抗日活动的）极端性镇压只会起到反作用！”^[30]结果在此情况之下，侵沪日军与公共租界的关系开始迅速走向恶化。

这种关系的恶化，显然将给日军未来的交涉造成更大的障碍。故认识到这一点后，松井于同月17日，与军队幕僚、冈崎总领事一道拜访了英军司令官史摩莱，并在会谈中表示：“在撤走丰田纺织英军士兵的问题上，……我军一直企盼不使战祸波及英军，而对于此等贵重之资产，英方亦选择放弃防守并提出了撤退，此乃对我军不危害英军之苦衷的体恤。同时，在上海地区的

英国财产除了少数例外，均未遭到破坏。……望贵方能充分理解我方之用心良苦，并向贵政府进行传达说明。我军将在上海与英军保持最为密切的关系，为东洋之和平而努力。”^[31]可以看到，为缓和两者僵化的关系，给日军接下来的交涉减少障碍，松井的态度在此时发生了一些转变，展现出从“强硬论”走向“亲善论”的趋势。而对于松井的这一讲话，史摩莱居然一改前日之态度，表达了肯定与赞同的意向。

主导公共租界的英国开始再次摆出妥协、退让的姿态，无疑说明日军的策略调整取得了相当之成效。因此他们又一次得陇望蜀，在三天之后的20日通过外务机关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樊克令(Cornell Sidney Franklin)正式递交了如下五项要求。1. 为禁止、消除抗日及危险活动，要求解散以国民党为首的所有团体结社，取缔相关海报与书籍的公开、演出、广播等活动，且镇压处决间谍或汉奸的行为；2. 驱逐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机关及其代表者，有效地监视其党政要人之政治活动，若有可能，应开展工作让宋子文、王晓籁等人自行离去；3. 令中方停止对邮政及电信的审查；4. 禁止中方对报纸及通信的审查；5. 尽全力撤除租界内的各种私设无线电设备，清洗租界内的中方抗日势力，对于我军的军事行动不施加任何干涉与反对，且工部局需就工作情况逐一进行详细汇报并将没收之文件转交我方。^[32]对于这些要求，樊克令仅以“技术上无法立即实现”等事为由，对第2、第5项要求提出了些许异议，其他则一概表示了允诺。^[33]故在此情况之下日军又迫不及待地于同日通过总领事馆武官原田熊吉再提一项要求：“期望今后在必要之际，日军还能借道、过境公共租界。”对此，樊克令虽然表示：“目前情势之下是否真有这一必要尚存疑问”，但最终被迫答复称：“日本原来便是公共租界之构成分子，故当然拥有军队穿行之权利，工部局对此并不反对”^[34]，再度表达了妥协的态度。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中国军队全面撤退、战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侵沪日军对其侵略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他们对公共租界的关注、与租界方面的交涉变得更为露骨与强硬。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日军开始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凭借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向租界施压，并最终阴谋得逞。这无疑为其日后更为积极的活动创造了条件，使其言行变得更加嚣张跋扈。

三、武力威慑与目的得逞

日军自战争爆发以来对公共租界的不断试探与施压，终于在1937年12月初进入了高潮。尤其在军队过境租界的问题上，如前文所述，虽然他们在11月下旬曾提出过相关要求，租界当局对此也表示了妥协，但终究是存在着抵触情绪的。然而到了12月1日，日军却突然下达了过境租界的正式命令并于两天之后直接付诸实施。那么，这一“上海租界史上从未有过先例”^[35]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日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样进行决策的，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本节拟就此展开探讨。

通过调查、梳理史料文献可以发现，尽管日军中央通过内部的争论与磋商之后最终向“华中方面军”正式下达进攻南京指令的时间是12月1日。但事实上在杭州湾登陆之后并未遭受太大损失的日军“第十军”，早在11月19日就已经率先实施了以南京为目标的追击行动。^[36]而东京方面于次日正式设立战时大本营的举动，与其说带有加强战争指导的意图，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向全体官兵暗示“坚决战斗的意志”。^[37]故在此情况之下，隶属于“上海派遣军”的第101师团亦从同月22日起开始遵照命令，为分兵进攻南京展开了为期两周的后方准备工作。^[38]这些战略决策的变动与发展，意味着驻守上海的日军接下来将会在其“后方”按部就班地推进军队的各类换防活动。

而正是在现地军官商讨这一后方准备及部队换防的过程之中，过境租界的问题被提了出来。11月29日，第101师团司令部高层开会商讨了“尝试让军队通过上海公共租界，以展示武力”的提案。对此，师团长伊东政喜首先表示：“若是上级命令，则将坚决实施，但在其具体方法上应该慎重考虑。”而该师团的工藤义雄、佐藤正三郎两位旅团长却随即表达了忧虑之情：“若其间遭到敌方狙击则反倒有损威严，故不可行。”结果，该提案暂时被搁置下来。然而到了下午六点，该师团参谋长西山福太郎专门走访了上级司令部与特务机关并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沟通，最终得到如下三点指示：“一、上级决定断然执行此方案，并将令特务机关专门负责与外国协商；二、虽然可能会发生狙击等事件，但并无大碍，外国必将对此严重戒备，而高层亦将对此负责；三、特务机关方面已确认无碍。”^[39]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读出如下两点重要信息：第一，此次过境租界的目的，并非是单纯为了军队换防，而是为了在换防的同时炫耀武力，以便向租界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乃至形成武力恐吓，加强对租界内抗日分子的镇压；^[40]第二，期望实现这一目的的驻沪日军高层，与担忧士兵安全的一线指挥官之间，存在着非常鲜明的意见分歧。但后者的反对意见终究无法对前者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就在内部协商的次日，即11月30日，第101师团司令部便秘密接到上级下达的指令：“于3日断然实施过境租界的行动，兵力大致定为：三个步兵大队及两个炮兵大队。”^[41]这显然意味着过境租界的命令并不是突然的决定，而是在驻沪日军高层的预谋之下，通过一系列讨论协商而最终确定下来的。

第二天，“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正式发布了3日过境租界的命令，并将这一决定通告给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对此，租界方面回应称：“关于此事，曾于11月20日对原田武官表示了‘为时尚早’的态度……因此若万一发生事情我方将概不负责。但是，仍要强行实施的话，则必须与工部局合作以便展开警戒工作”^[42]，展现出了既不满又无奈的态度。而看到租界当局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日军便按部就班地开始推进筹备工作。12月2日，第101师团与第3师团正式履行了交接“上海警备任务”的手续，并于上午十点左右向隶下第157联队的德永大队、柴田大队等部队下达了整顿军容军貌、准备执行过境行动的指令。^[43]日本的驻沪外务官员亦遵照军方的要求，向工部局发去了要求严密戒备的照会。

12月3日，过境租界的行军正式开始。关于当天的情形，日军第101师团长伊东政喜的日记、第157联队的战史都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记载。据称，日军的过境部队是在上午十点集合，并于十一点自丰田纺织工厂东南方两百米处的一十字路口吃过午餐后出发的。到场者除行军部队以外，亦有日方特务机关、宪兵队、司令部参谋等相关人员参加。日军部队以军旗为先导，排成三路纵队，于十二点四十分左右全部开进了公共租界境内，并沿中山路先后经由孙家宅、赵家宅、静安寺等地在租界内穿行（行军路线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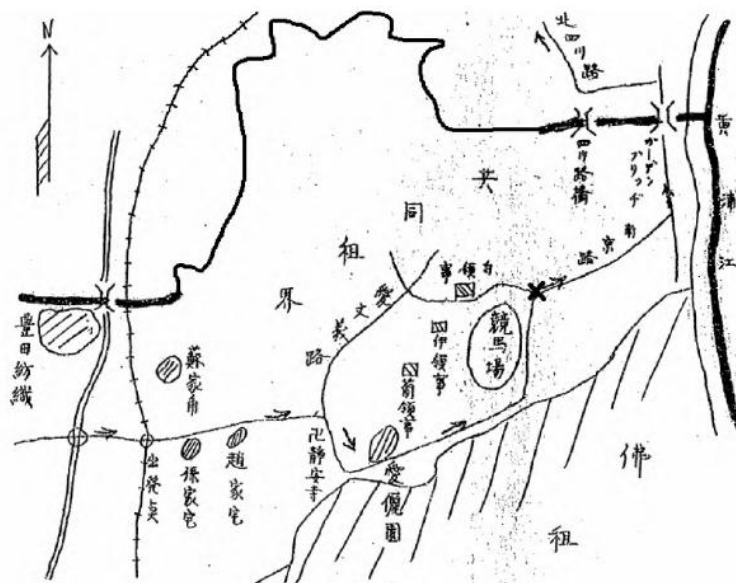


图2 1937年12月3日日军过境公共租界的行军路线

资料来源：基于下述资料中的地图制成：《上海附近的警备（第1次）步兵第157联队第1大队战斗详报》，1937年11月20日—1937年12月7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中国事变上海·南京—155_2。

说明：图中的“→”表示日军部队的行军路线，“×”表示炸弹事件发生的地点。

沿途有日本居留民团组织的大批驻沪日侨手持国旗夹道欢迎，而租界的警察则在旁边负责维持秩序。然而，日军从跑马场进入南京路西北入口处时，突然有一名中国抗日青年从附近十层建筑的三楼位置向日军队伍中扔下了手榴弹，导致四名日兵当场负伤，其中一人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由此，行军活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且有部分英国人抢夺、扯毁日本国旗的事态发

生。而那名中国的抗日青年，则在现场被租界警察的手枪射杀。直到十分钟之后，日军才在原地留下一小队兵力驻防，重整队形继续行军，并于下午两点左右从南京路开抵花园桥(当时称:Garden Bridge，现称外白渡桥)后，返回了日租界。^[44]

但是，日军关于此次炸弹事件的交涉却并未就此结束。或者不如说，炸弹事件恰好为日军向租界进一步施加压力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借口。在行军结束后仅过半小时，第101师团第102旅团的工藤义雄旅团长便尾随“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到访了日本总领事馆，通告相关情况之后与在场的驻华大使川越茂商谈了向租界提出要求的方案^[45]。基于这一方案，日军继续保持了在租界内一个小队规模的驻兵部队，并随即向工部局方面追究责任，发去如下四点强硬要求：“一、同意日军今后在必要场合，不需通报便可自由进出公共租界；二、工部局警察应保证今后努力杜绝此类危险事情不再发生；三、今后若再出现此类危险事件，日军将认定工部局警察不具备维持治安的能力而采取适当且自主之行动；四、若日军认定取缔工部局警察的工作存在漏洞，则将在搜查、检阅等事宜上采取适当且自主之措施。”^[46]即要正式确立起日军在公共租界的自由通行权，并对租界的警察权施加严密的监督，以期在压制中方抗日活动的同时，逐步蚕食工部局的权力。在接到这一过分要求之后，工部局的警视总监随即向参事会进行了通告。而参事会对此却毫无办法，不得不再次站在妥协退让的立场上于晚上八点以公文的形式表示：“我方今后将采取一切努力之手段，严防此类事情再度发生。”^[47]而日军见施压的目的基本达成，方才同意撤退了驻军。

可以看到，尽管租界方面日后在工部局的行政权^[48]等诸多原则性问题上采取了拒绝让步、不断周旋的立场^[49]，但终究通过此次过境行动与炸弹事件，日军向租界施压的阴谋得逞了。他们不断向公共租界这一“中立地带”渗透势力、加强监视，在大幅压制中方敌后抗战力量的同时，也在另一方面促使自身在租界的影响得到了显著提升。

四、结论

拙论基于既往研究的宝贵成果，结合中日两国的文献史料，对中日战争初期侵沪日军与上海公共租界之间的摩擦与交涉进行了考察，以期从一个侧面窥探出战争初期日本与英美列强的微妙关系。如上所述，在侵沪战争爆发以后，无论是日军中央还是前线日军，虽然都曾表示出要尽力回避与列强摩擦的态度，但实际上对于公共租界的援华立场是极为不满的。他们企图寻找机会，采取一些手段迫使列强撤走驻军，从而取代他们在上海的优越地位。结果在1937年10月下旬战线推进到苏州河沿岸之后，由于中国军队的阵地紧邻租界西部边界，日军终于以军事作战为借口正式展开了行动，与驻沪英军进行接触。这一接触，最初是以“丰田纺织的接管问题”“出云号水雷艇问题”为契机，采取试探性手段展开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租界方面却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摆出了妥协、绥靖的态度。这让日军看到了进一步提出要求的可能性，态度变得愈发强硬了起来。

11月上旬中国军队全面撤退以后，日军的侵沪方针开始从“军事战略为主的阶段”走向了“战略与政略相互结合的阶段”。这一变化，预示着他们将会在此后对公共租界提出更多的要求，施加更大的压力。通过调查日方史料可以发现，正是在这一时期，日军开始积极主动地与租界方面展开交涉。他们利用多种渠道，时而强硬施压、时而大谈亲善，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公共租界进一步退让，并大体接受了五项要求。而这些要求，正是以打击中方抗日活动、渗透日方势力为主要目的的。进而，到了同年12月初，随着进攻南京的计划付诸实施，日军的要求与施压又再次升级，达到了顶峰。其代表性事件便是12月3日过境租界的示威行军。虽然在策划该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侵沪日军高层与一线指挥官的意见分歧，但终究为了炫耀武力、实施恫吓，日军蛮横地展开了行动。而在行军时突发的炸弹事件，又为日军进一步提出要求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口实。结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租界当局再次摆出了屈服的态度，接受了四项强硬的要求，导致中方在敌后的抗战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日方的影响大幅增强。但也正是因为日军的嚣张跋扈，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中方的抗战斗志，招致了列强的厌恶与反感，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注释：

[1]其中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孟彭兴：《南京大屠杀的预演——“八一三”日军在上海暴行考略》，《史林》1993年第2期；房建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对来沪德国犹太难民的利用》，《德国研究》1997年第4期；甘慧杰：《论孤岛时期日本对上

海公共租界行政权的争夺》，《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陈细晶：《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1937—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霍慧新：《在沪日侨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山村睦夫：《战前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社会与排外主义》，《和光经济》2015年第47卷第3号，等等。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论述侵沪日军的暴行、造成的破坏、在上海的统治策略以及日侨的情况，涉及日军与公共租界关系的成果付之阙如。比如甘慧杰先生的研究侧重于探讨日侨通过工部局参事会选举争夺公共租界行政权的事情，对于日本军方的相关政策与行动却并未展开分析。

[2]严格地说，上海公共租界应该包括日本主导的部分（即覆盖虹口与杨树浦在内的日租界）和英美主导的部分。但为了方便论述分析，以下将暂且把前者称为“日租界”，将后者称为“公共租界”。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拙文作为研究对象所提及的“公共租界”，主要是指由英国势力主导的，执掌公共租界行政事务的工部局，即“租界当局”，以及主要负责公共租界军事事务的驻沪英军，或简称“英军”。而作为另一个研究对象所提及的“日军”，则是指侵略上海的前线日军，即“侵沪日军”。由于当时日方的内部存在着东京的日军中央、前线的侵沪日军，以及驻沪外务当局等不同单位组织，其态度未必一致。故需要在此首先说明，拙文主要探讨分析的，是前线侵沪日军的情况。

[3]日军参谋本部：《临命第452号》，1937年8月16日，森松俊夫编：《临参命、临命、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2：1937年卷》，东京：MT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另，还可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第267页。

[4][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86页。

[6][7] 可参见松本重治著、曹振威等译：《上海时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88页、第587页。

[8]同时为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坚决抗战的决心，留下了部分军队在闸北死守。

[9]古川隆久、刘杰、铃木淳编：《第101师团长日志：伊东政喜中将的日中战争》，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第217—218页。

[10]曾有国内外学者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调查与分析，指出：尽管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但其与大后方仍旧保持着各种贸易关系。比如1938年自上海租界发往大后方的交易额便占到了上海国内输出总额的63.5%，且直到1941年日军占领租界为止，这一额度都基本保持在60%左右。尤其经由宁波、温州、香港通往大后方的运输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宁波与温州两地，背后开通公路，经浙赣线可以联系粤汉线、湘桂线，且通过公路亦可连接柳州、贵阳、重庆。经由这些路线，大量的棉纱布、化学药剂、机器等战略物资被运往大后方。上述内容可参见：袁燮铭：《上海孤岛与大后方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张赛群：《上海“孤岛”贸易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8页；今井就稔：《日中战争初期上海租界经济与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等。

[11]“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内部的“下克上”风气就越来越严重，日军中央对于前线日军的控制力是十分有限的。战争中，前线日军指挥官往往会基于当地战局的变化，迅速做出自主性的判断并直接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对此，日军中央往往只能在事后对其加以追认。此时期侵沪日军的情况亦是如此。拙文在此涉及的侵沪日军之行动，事实上未必都曾与日军中央进行过沟通。在他们看来，战局瞬息万变，很多事情必须当机立断乃至独断专行。在此情况之下，甚至曾发生过未经东京方面批准擅自向南京方向发起追击的行动。可参见笠原十九司：《日军的治安战—日中战争的实像》，岩波书店，2010年，第29页。

[12]可参见奥田茂编：《第3师团乡土部队史》，岐阜：岐阜文艺社，1967年，第17页。

[13]台湾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编：《蒋中正日记》，非卖品内部资料，2015年，第125页。

[14]10月24日就曾有一架日军飞机袭击了英军士兵，导致一死一伤。为此，英方甚至曾考虑在空中升起气球提示日军飞行员注意回避英军空域。可参见《申报》1937年10月25日版。

[15]可参见“英国驻屯军守备区域相关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16]日军报告原文中记载的是进入苏州河后的“第七座桥”，经查当时的上海地图，第七座桥为老闸桥，即现在上海市的福建路桥。由于当时毗邻公共租界，故由英军负责把守。

[17]可参见“出云水雷艇的苏州河溯航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18]可参见《申报》1937年10月30日、11月1日版。

[19]“松井司令官与各国军队司令官之交欢”，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20]“英军守备区域之炮弹落下事件”，日本陆军省：《陆支密大日记第9号》，1937年，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S12-3-98。

[21][22]“出云水雷艇的苏州河溯航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23]可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年，第493页。

[24]但对于追击的范围，即究竟是追击到“苏州—嘉兴”一线，还是直接追击到南京，仍存在激烈的讨论。

[25]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93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26]1937年7月24日晚九点半，三名日军陆战队士兵在日租界的虹口地区接到一名伪称冈崎良雄的日侨报告，称发现一日军水兵与中国人在狄思威路打架后被绑架而走，并拾得军帽一顶、领带一条。接此报告后，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动员了一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组成搜索队四处搜查，并架起机枪、出动了装甲车。导致日租界阴云密布、人心惶惶，仅半天时间便有数万华人逃往公共租界。结果在四天后得知，失踪的日本水兵乃陆战队司令部大队副官宫崎定雄，因出入日军明令禁止之妓院而畏罪潜逃失踪。

[27]“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28]“松井司令官的采访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29]“松井司令官的采访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30]“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31]“松井司令官与各国军队司令官之交欢”,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32]可参见“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33]可参见“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34]“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35]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上海史》,东京:东方书店,1995年,第209页。

[36]据载,第十军司令部曾于11月19日向东京方面发去了报告,称:“我军已于19日清晨下达了尽全力向南京追击的命令。”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02页。

[37]可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413页。

[38]可参见古川隆久、刘杰、铃木淳编:《第101师团长日志:伊东政喜中将的日中战争》,第254页。

[39]可参见古川隆久、刘杰、铃木淳编:《第101师团长日志:伊东政喜中将的日中战争》,第263页。

[40]关于这一意图,“上海派遣军”报道班班长曾在对媒体的谈话中有所涉及,能够提供一些佐证:“自中国事变以来,有不少(中方)残败士兵逃入上海公共租界这一外国人权益地区开展活动,而皇军威严始终无法波及。”《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3日版。

[41]古川隆久、刘杰、铃木淳编:《第101师团长日志:伊东政喜中将的日中战争》,第265页。

[42]“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43]可参见重信嵩雄:《福井部队血战记》,千叶:千叶日报社,1963年,第79页。

[44]可参见重信嵩雄:《福井部队血战记》,第91—92页;古川隆久、刘杰、铃木淳编:《第101师团长日志:伊东政喜中将的日中战争》,第273—274页;“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2册,1937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45]可参见古川隆久、刘杰、铃木淳编：《第 101 师团长日志：伊东政喜中将的日中战争》，第 273 页。

[46]“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 2 册，1937 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47]“租界内排日策动取缔问题”，日本东亚局第一课：《中国事变相关执务报告》上卷第 2 册，1937 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东亚-48-B02130172900。

[48]由于当时中国所签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一项不仅仅是指司法意义上的外国领事裁判权，还包括了课税权、警察权等更为广泛的范畴，故这里所说的行政权是包含在“治外法权”里面的。可参见高纲博文著、陈祖恩译：《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32 页。

[49]可参见甘慧杰：《论孤岛时期日本对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的争夺》，《档案与史学》2001 年第 6 期。